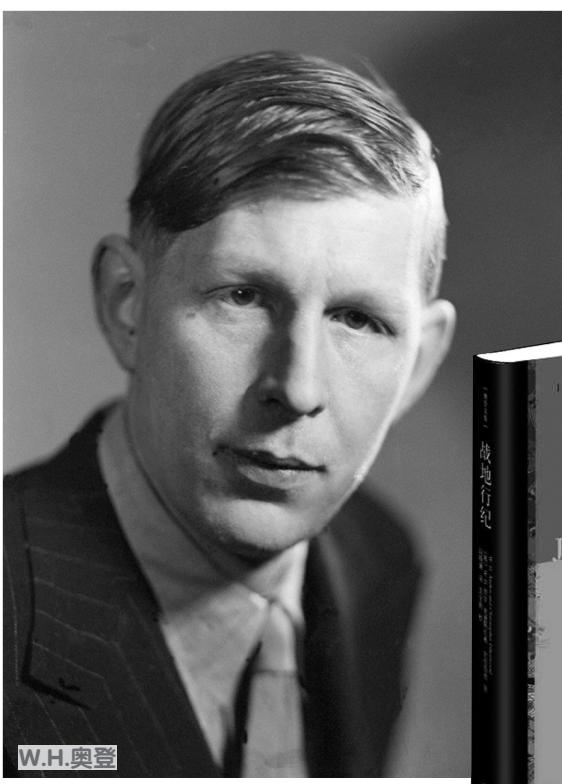


經典



W.H.奧登

《戰地行紀》產生的大背景是什麼？

對歐洲來說，1938年是一個沉悶之歲；離二戰爆發還有一年，各國坐在火山口上，仍維持着微妙的對峙平衡；那邊，西班牙弗朗哥在德國援助下擊敗了左翼力量，奧地利將被德國吞併，而英國還在執行绥靖政策拖延時日，根本想像不到兩年後的敦刻爾克撤退。這句話，新聞界和知識界雙双遭遇了所謂的‘題材枯竭期’。此際，中國正值抗戰進入第二年，鶴立雞群地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前線，當仁不让地成了世界熱點新聞的來源地。彼時是紙媒為王的時代，作家擔起報戰况報道的臨時職責，對市場導向的媒體出版界來說，也是頗為正常的反應。作家的身份比較靈活，沒有新聞報道的時間限制，又可作深度的觀察與評論，倘若文筆又很好的話，他們的專文比之報章記者發出的干巴巴的電訊稿，可讀性要強很多。

一時間，民國政府的臨時首都武漢好不熱鬧。

3月9日，英國詩人奧登和作家衣修伍德到武漢的第二日，就出席了由國民黨宣傳部組織的新聞發布會。外媒記者人數之多，氣氛之熱烈，讓人驚奇；在某種程度上，如此密集的實地報道中國，在中外雙方來說都是史上絕無仅有的一次。

彼時中國或到訪過中國的英美詩人不乏其人，譬如燕卜荪和瑞恰慈，他們深愛彼時的中國，但他們在作品中並沒有寫到中國；也有來了覺得隔膜，过后只



《戰地行紀》中文版

字沒寫的，譬如美國詩人蘭斯頓·休斯，英國詩人埃德蒙·布倫頓。而奧登在訪問中國之後，却寫出了極為重要的《戰爭時期》十四行組詩（又稱《戰時十四行》）。

奧登和衣修伍德為何寫這本書？

是應約而寫。

之前的1936年，奧登與好友路易斯·麥卡尼普曾結伴前往北歐，兩人合寫了一本旅行讀物《冰島來信》；次年交由蘭登書屋和法伯出版社出版，初版就印了8000冊（這個印數在當時已是相當可觀），評論界也給予了好评，還入選了英國读书協會的推薦書目。這讓奧登很受鼓舞，他的收入狀況因此改善了一些；幾個月之後，他寫信告訴一個朋友說：“我賺了些足夠糊口的钱。”

有了這個成功先例，藍登書屋與法伯出版社再邀奧登與衣修伍德寫一本詩歌、照片、散文合璧的“旅行讀物”，但指定了必須去亞洲某個國家。當年7月，適巧中日戰事爆發，目的地已不言自明。

來中國時，兩人剛過而立之年，奧登31歲，衣修伍德34歲，他們帶着新晉才子的傲氣，外加高中學童的調皮勁兒，又好奇，又忐忑，就這麼煞有介事地來到了中國。他們是頭一回在蘇伊士以東地區旅行，既不會說中文，對遠東情形也只是從書籍報章上了解個大概。

《戰地行紀》：七十四年后的重訪

□馬鳴謙

這個年紀的奧登，正站在路向抉擇的关口，用他後來那部作品的標題，他正处在自己的‘焦慮年代’。

1937年，奧登出版了詩集《看，陌生人！》，並因這部詩集獲得了國王喬治六世授予的國王詩歌金質獎章，在英國正聲名鵲起。在這個多事之秋，他俨然成為了民族代言人。这一年他曾去西班牙待了一陣，為共和政府開過救護車，在電台宣傳部門干了一陣，後來又去了阿拉貢前線；結果，他發現政治現實遠比他想象的更為曖昧和麻煩。几星期後，他悻悻離開了西班牙。此後，在《西班牙》一詩發表後，奧登還因這首詩中的“今天/死亡的機率有預謀地倍增/在必要的謀殺中清醒地容忍那罪惡”的句子，招來了喬治·奧威爾的語言攻擊，引发了一場筆戰。總之，西班牙之行對奧登來說不怎麼愉快。他已深深厭倦了意識形態的爭辯。

在當時英國左翼知識分子看來，此時的中國正是法西斯主義與正義力量全球對決的遠東前線，中日戰爭正是西班牙內戰的一個遙遠的翻版：啟程前，奧登和衣修伍德希望中國不會像西班牙那樣，擠滿了“明星文學觀察家”。對他們來說，中國之行是第二次機會——衣修伍德正懊悔自己沒去成西班牙，而奧登覺得自己之前在西班牙一无所获。

這本書的誕生，自有兩位作家小小的私人動機，正如奧登所言：“所有的藝術家都必須擔負起一點新聞記者的職責……我們會有一場屬於我們自己的戰爭。”

這裡，確乎存在着某種私底下的題材競爭。

奧登和衣修伍德一路都見了哪些人？

在广州，拜會了笑聲不斷、說着蹩腳英語的廣州市長曾養甫，後面和廣東省行政長官吳鐵城吃了頓飯。

在漢口，于外媒新聞發布會上再遇同船來華的戰地攝影記者卡帕和荷蘭人弗恩豪特（伊文思《西班牙大地》的攝影師）；其後先是拜訪了擔任國民政府私人顧問的陳納德將軍，經將軍引荐，又見了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的馮·法肯豪森將軍；結識了史沫特萊，由史沫特萊寫了介紹信，又見了八路軍漢口辦事處的博古；3月14日，由陳納德引荐，兩人採訪了蔣夫人宋美齡，領略了夫人的談吐風采，像模像樣

問了若干問題後正欲離開，又巧遇正好上樓的蔣介石，而蔣本人“在這個私人場合，顯得和藹而腼腆，為拍個合影，站着绷緊了身體，像個被罰站的學童”。

在西安，見了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在徐州，見到了李宗仁，然後去了台儿庄戰區前線。

回漢口，參加了一個知識界歡迎茶會，與會的有劇作家田漢、洪深，詩人穆木天，還有會寫詩的將軍馮玉祥，“他是那種如鯨魚般庞大而仁慈的人物，無言而自威”。還接受了《大公報》記者唐納的採訪，訪問了武漢大學，見了10多個教授，其中有文學院院長陳西濤，他的夫人凌叔華送了奧登和衣修伍德兩人各一把扇子作為禮物。這還未完，兩人几日後又在保鏽簇擁中拜會了青幫大佬杜月笙，此時的杜月笙擔任了紅十字會要職，正為籌劃戰地醫院而出力；而奧登在去給史沫特萊拍照時，又巧遇了周恩來，他們作了交談，奧登還給周恩來拍了照。

在南昌，見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在華，見了浙江省主席黃紹竑將軍。

在上海，美國女作家項美丽介紹他倆認識了出版人和詩人邵洵美，最後還拜會了路易·艾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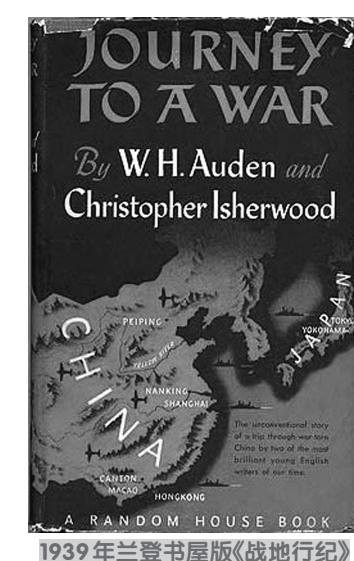
檢視這份名單（還漏了很多有名無名的中外人士、販夫走卒），我們發現它幾乎將當時活躍在中國的政軍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掃了一遍。由此可以設想，他們此行定然得到了英國駐華各使領館的大力襄助和預先安排，而國民政府亦亟需外籍記者和作家對中國抗戰的跟進報道，官民上下全體配合，在外宣方面張開了熱情歡迎的怀抱，於采访接待的諸多細節上都做足了文章。

奧登和衣修伍德這一路可谓是暢通無阻。

《戰地行紀》除了史料價值，文學價值如何？

《戰地行紀》從外部人的視角，為我們報道了一個真實的抗戰中的中國，沒有夸飾，沒有渲染，並不回避社會與人性的灰暗面；加之奧登和衣修伍德本就有些頑童脾性，他們筆下的中國拼圖感覺很混搭，甚至有些可笑，但細心的讀者將會發現，這樣出現的國人的面目却顯得真實而純粹。那時，正是整個民族心氣昂揚、空前團結的年代。

當然，它更有不可磨滅的文學價值。收入此書的《戰爭時期》十四行組詩（亦



1939年蘭登書屋版《戰地行紀》



我們剛離開中國，邵洵美便開始着手翻譯奧登詩作。1938年12月1日，他在自己主編的《自由譚》1卷4期上刊出了奧登《戰爭時期》組詩第18首（中文題名為《中國兵》）的譯文，此時，奧登與衣修伍德合著的這本《戰地行紀》還沒有正式出版；其後，邵洵美又連續在《南風》第一期（1939年5月15日）、第二期（6月15日）、第五期（9月15日）推介奧登的作品，稱之為“我們所切盼的‘伟大的作品’”。

另一位較早译介奧登詩歌的是朱維基先生，他的名字在今人耳里聽來已很陌生，却也是一位頗有建樹的翻譯家，曾譯過弥爾頓的《失樂園》、拜倫的《唐璜》、但丁的《神曲》、盧森堡夫婦詩選等。1941年5月，上海國民書店出版了由他譯出的奧登詩篇，收錄了奧登在《戰地行紀》一書中的前篇序詩6首，十四行組詩27首詩，以及篇末的詩體解說詞；書前還附了一篇長達36頁的引言，詳盡介紹了奧登躋身詩坛的背景、他的詩艺特点，還逐個分析了組詩每首詩的含义。尤須記取的是，恰在1938年，朱維基在上海與蔣錫金等人合編了詩歌刊物《行列》，創作了不少抗日詩歌；上海沦陷後，日方對愛國文化人士進行輪番迫害，他與陸蠡、夏丐尊、趙景深、李健吾等文化人士先后身系囹圄，數遭酷刑，被監禁了好幾年；而陸蠡先生更遭日本宪兵隊杀害，在此也須銘記一笔。

《戰地行紀》中的詩文告訴我們，文學中的正義實現，並不在於一時激憤的報道，也不會因自踞於某種意識形態或文學聲名的權威堡垒就唾手可得，它需要寫作者本人具备超越俗見的人格特質（對一個真正的詩人來說更是如此），這個特質就是深刻而冷靜的洞察力，以及對語言本身的探索。

74年後，借着這本《戰地行紀》的出版，奧登再度“來到”中國，值此《奧登文集》第一部出版之際，謹向他、衣修伍德以及所有的譯介前輩們致敬。

天涯異草

《哈立德之書》：你看到哈立德的身影了吗？

□石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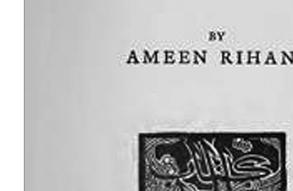
《哈立德之書》是第一部阿拉伯裔美國小說作品，奠定了後世阿拉伯裔美國小說創作的基礎。1911年，該書由美國托德·米德公司首次出版。這部小說不僅生動記錄了作者埃敏·雷哈尼（Ameen Rihani, 1876-1940）早年移民美國的生活經歷，更表現了他作為一位置身於阿拉伯傳統文化、西方經典文化與西方現代科技與物質文明中的敘利亞知識分子，對東西方關係、民族、政治、宗教、文化以及現代社會中人的自由與解放的審視與思考。

整部小說以解讀“我”——小說的講述者——偶然在開羅科第維亞圖書館發現的署名作者“哈立德”的手稿為主要內容，除去作為全書緣起和鋪墊的序言部分，依照哈立德的手稿，共由三部分組成：“致我的兄弟——人類”、“致我的母親——自然”、“致我的創造者——上帝”。這三部分分時性地記敘了移民美國前、移民途中、在美國以及重返故里敘利亞後哈立德的经历與思想。小說敘述結構清晰，一條是哈立德的手稿，一條是薩克伯（小說主要人物，同時也是哈立德的摯友）的回憶口述和他的《個人史》，而作為旁觀者與記錄者的“我”不時插以評論，三者或平行或交叉，將哈立德的人生經歷與心路歷程，以大大小小的“片段拼貼”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

小說帶有濃郁的傳記色彩，完整讲述和記載了哈立德的一生。哈立德的家乡在黎巴嫩附近的一座普通小城巴爾貝克，那里有着純淨靜謐的自然美景，卻籠罩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政治高壓與沉悶嚴苛的宗教約束。哈立德出生在一個馬龍派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誠本分的信徒，而他本人却時立獨行，桀骜不馴，向往自由，與古朴沉悶的黎巴嫩小城格格不入。不過，他即使因此傷痕累累，也始終毫不妥協。從一头駝子起步，哈立德用短短的几年實現了人生的第一个理想——擁有巴爾貝克最好的馬，意氣風發的他很快就不再滿足于此，而將目光轉向更遠的方向：“他從沒滿足于可見的地平線，无论

THE BOOK OF KHAL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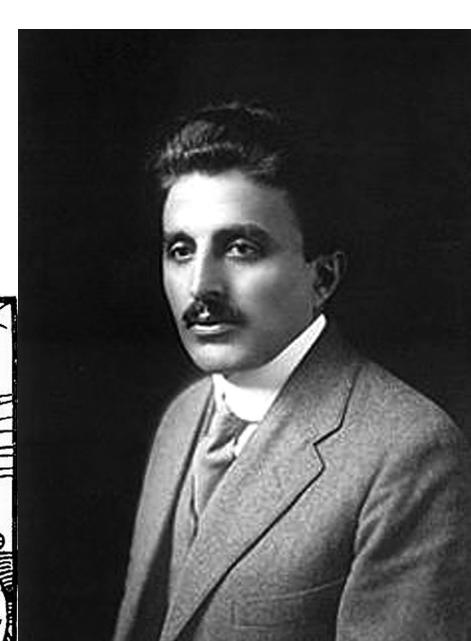
BY AMEEN RIHANI



《哈立德之書》英文版



《哈立德之書》插圖



埃敏·雷哈尼

它多寬廣多美麗。他的靈魂總是渴望遠在視野外的，看不見的遠方。”不久，哈立德將自己的馬賣給了一個旅行者，得到100個英國金幣，用這筆錢他和朋友薩克伯一起去了美國。移民之旅讓兩個天真的年輕人吃足了苦頭，几經波折後，帶着被榨干的錢包和滿身的疲憊以及對人性丑惡的更真切了解，他們終於到达美國，落腳在紐約一個敘利亞人社區。最初的日子極其艱苦，他們租住在一个終日積水的陰暗破敗的地下室，像那一時期大多數來自敘利亞的移民一樣，以兜售所謂來自“聖地”的宗教小飾品為生。好在在他們的精打細算與用心經營下，日子一天天好起來。隨着生活的逐漸穩定與經濟壓力的減輕，哈立德漸漸不滿意自己的生活，一直盤踞在他內心的聲音越來越清晰，少年時代就執著的對生命意義的探索，對偉大、崇高與祌聖的人生的追求，再一次令他心緒難寧。往日令他開心滿足的買賣行當，此時在他眼中成了無耻的欺騙。他不再和薩克伯一起賣貨，甚至最終當眾掉自己的貨品與貨擔。

同時，他帶着盲目的狂熱，懵懂地探寻實力、崇高與祌聖人生的途徑。他苦學英語，希望能從西方文明中找到答案。他徹底荒廢了生意，日日流連于二手書店，將積蓄花于買書、读书、聽演講，直到一次因無錢付費而被自己崇拜的偶像冷眼拒絕時，他才幡然醒悟。

這些人根本不是自由思想家，而是厚顏卑鄙之徒，他們大肆宣傳精神的潔淨之道，其實他們自己的心灵與靈魂才最該好好清洗淨化。” 偶像的不一言行，使他借助文化拯救灵魂，實現祌聖人生的期望破滅。失望之余，他轉而迷信自己的直覺。一把火燒掉自己的所有西方典籍後，他一头扎入醉生夢死的波希米亞生活。遺憾的是，從那裏他仍然沒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失望的哈立德又做了多次嘗試，做过律師助理，還當過社區競選募捐員，對於西方社會的法律與政治体制，他曾满怀热望，但最終

勇敢地去履行自己的使命。走出深山的哈立德視自己為阿拉伯民族與全人類的代言人，是自由解放思想的布道者。他走進一個個城鄉村，向人們宣揚自由解放的思想，鼓勵敘利亞人擺脫奧斯曼政權的統治。他的政治見解與宗教思想很快引起轟動，有人視他為先知，對他推崇有加；有人視他為異端，欲除之而后快。哈立德的言行不久就引起了奧斯曼政權的注意。他在大馬士革大清真寺的演講，引發巨大騷亂，被土耳其政權下令抓捕。在友人的幫助下，哈立德逃回巴爾貝克，在那兒與薩克伯重逢。從薩克伯口中，哈立德得知瑪麗死了丈夫，還得了嚴重的肺病，和年幼的儿子相依為命。於是，逃亡中哈立德帶上了瑪麗母子，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可好景不長，瑪麗的儿子因腦病夭折，悲痛欲絕的瑪麗肺病復發，也很快死去，不久，哈立德也消失在茫茫沙漠，不知所踪，小說至此戛然而止。

哈立德去了哪里？這是每個讀者掩卷後都心心念念的謎題。解答這一謎題不妨將目光投向小說的作者埃敏·雷哈尼——作家、詩人、哲學家、政治活動家。與哈立德相似，雷哈尼也來自黎巴嫩的馬龍教派基督教家庭，同樣也是在11歲時移民美國，其後同樣返回了家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雷哈尼本人也曾同哈立德一樣有過深山靜林中的隱居冥修。1905年，雷哈尼離開紐約回到黎巴嫩，在山林中隱居長達6年。小說中我們知道雪松林中的冥想帶給哈立德精神世界的是脫胎換骨的變化，那些大彻大悟也不正是雷哈尼本人思想的沉淀與升華？《哈立德之書》是雷哈尼6年冥修的思想成果，更是他人生前35年的重要記錄與反思。這部小說既是雷哈尼青涩少年與糾結青年時代的真實摹寫，也是一名阿拉伯青年知識分子在阿拉伯傳統文化、西方經典文化與西方現代科技與物質文明碰撞中的精神歷練記錄，同時更是雷哈尼向古老的阿拉伯世界以及繁華浮躁的西方世界發出的振聾發聳的戰書，它宣告了一個融貫東西的和諧大同世紀的開始。哈立德去了哪里？在走出深山，進入紅塵，從此活躍於西方世界與阿拉伯世界，游走於各國政要與阿拉伯族酋長之間，傾其一生不知疲倦地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努力架起理解橋樑的埃敏·雷哈尼身上，你看到哈立德倔強不屈的身影了吗？

隱居和冥思不僅治愈了哈立德身體的疾痛，平復了他多年糾結煎熬的心靈，更使他跳出個人得失的桎梏。他不顧友人的勸阻，毅然結束隱居生活，重踏俗世，